



# 不搞特殊的“陈大姐”

◎王鹏

陈少敏，原名孙肇修，1902年出生在寿光。陈少敏自小就随父读书，19岁时家乡遭灾荒，父兄等不幸去世。为减轻家庭负担，她独自到青岛当女工，后加入了邓恩铭等人组织的秘密工会，开启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战争年代，陈少敏是我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还是新四军第五师的主要缔造者，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

1948年因病休养期间，陈少敏回到了家乡——孙家集镇范于村，看望日夜思念的老母亲。中午，前来做警卫任务的胡营区委书记陈雷同志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谁知陈少敏走进餐室，见桌上有鸡有鱼，摆了七八个菜，随即沉下脸来，问道：“这酒肉钱从哪里开支？”陈雷同志赶忙回答：“大姐，这是同志们的一点心意。”见大家尴尬不堪，陈少敏温和地说：“同志们，别把我当首长、当客人。现在刚解放，群众还在吃糠咽菜，咱能吃下这大鱼大肉去？我从小吃惯了家乡的小葱煎饼，还有虾酱，咱就按老菜谱吃！这酒菜钱我来付，把它们送到烈军属家去。”

大家见拗不过她，只好陪她吃了一顿葱卷煎饼。饭后，陈少敏写了8个大字：宁公而贫，不私而富。

没过几天母亲因病去世，陈少敏从简办理了丧事。临走时，她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官僚之下无民主，强权之下无幸福。我们千万别忘了群众利益第一！”陈少敏凡事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展现出高尚的品格。

# 李文藻：为官清廉，为人坦荡

◎王岩

李文藻(1730年-1778年)，字素伯，一字菑晚，晚年又号南涧，世居青州南阳城。清乾隆年间藏书家、目录学家、金石学家。早年在青州松林书院读书，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第二名中举，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选任恩平(今广东恩平)知县。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任广东乡试副考官。此后又任职新安县、潮阳县，擢升桂林府(今广西桂林)同知。因长期任职岭南，长年累月奔走于崇山峻岭之间，染上瘴气，不幸去世，年仅48岁。

## 精明强干，体恤民情

李文藻居官以精明强干、体恤民情著称，事必躬亲，政绩突出。在任期间，他走村串户，调查民情，处理政务。为疏通楚南粮道，曾三次徒步考察古灵渠，亲自到田间地头与农民促膝交谈。他断案“打衙受讼牒，一日百余纸”，曾“下乡促尸骨，数人鮑鱼肆。潮狱深夜分，废餐且罢睡”，“心血耗恐涸，颌底增雪刺”，心血耗尽，须发变白。这就是李文藻为官的真实写照。

当时岭南盗牛事件屡屡发生。由于牛的毛色相似，虽多次抓获盗牛者，但大多狡滑抵赖不承认，致使官府无可奈何。李文藻刚到恩平任职，即下令让养牛者在自己的牛角上烙印，留下印记。凡到市场卖牛的，经纪人先把烙印登记在簿，并将印记交付买主。如果有丢失牛的，先以印记呈官，官遣衙役持印记查验市场记录，不得隐瞒。如此，盗牛者再也无法耍赖，使盗牛事件速减。其上级肇庆府知府认为李文藻此法甚好，下令在各县推广。

同属肇庆府的阳江县的知县因事被弹劾，由于他之前与李文藻不和，便认为是李文藻作梗，派亲信到恩平县，暗中调查两个月，图谋报复李文藻，结果一无所获。后来，李文藻任职潮阳、潮阳民风强悍，百姓械斗不止，伤亡事件经常发生，社会治安混乱。李文藻到任后，先从治理械斗着手，大力整治社会秩序。他命人在县衙大堂上悬挂一个“钲”。“钲”是一种铜做的军用打击乐器，能发出洪亮声音。他下令乡约，地保只要发现哪个村有械斗征兆，立即入城击打铜钲。县衙衙役听到钲响，迅速前去去治械斗者，很快械斗恶习被止住。

## 居官清贫，著述颇丰

李文藻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一人仕途就向自己的恩师钱大昕保证：“宁人讥政拙，未感负初心。”广东的潮阳、海阳、揭阳俗称“三阳”，其地物产丰富，在此为官者大多致富。但李文藻“去官之日，囊橐肃然”。他还自嘲说：“官居之贫，山水之奇，金石文字之富，未之有也。”

李文藻博览古今，购书不惜重金，藏书充栋盈车，还酷爱金石研究，成为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著有《泰山金石考》12卷、《益都金石考》4卷、《金石书录》4卷、《山东元碑录》1册、《云门碑目》1册、《尧陵考》4卷等大量金石学著作，还写有《岭南诗集》、以及《南涧文集》《毛诗本义》《南北史考略》《濮雅》《青社拾闻》《短竹录》《隶补》《国朝献征录》《齐谚》《粤谚》《师友记》等。此外，他还主持或参与编纂了大量地方志，其中《历城县志》和《诸城县志》被列为全国名志。

## 为人坦荡，一片赤诚

李文藻为人坦荡磊落，与人交往一片赤诚，重情重义，其人格魅力和文学才华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人们，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后人。

李文藻交游广泛，所至必结交贤豪长者。钱大昕赞其“居家之孝友，当官之廉干，与友之诚信”，除钱大昕外，他与纪晓岚、翁方纲、戴震、王昶等硕师大儒交往甚密，亦师亦友，多书信往来。纪晓岚为李文藻的房师，称李文藻“学有根柢而行笃实”，文藻有诗道“不奉市墓十余载，知音未报鬢毛疏”，视纪晓岚为知音。文藻之父李远去世后，极少为人作志的学士纪晓岚破例为其父作墓志铭。

而李文藻与钱大昕的交往更为为谈。钱大昕是清代史学家、汉学家，18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之一，被王昶、段玉裁、王引之、阮元等著名学者公推为“一代儒宗”。钱大昕在《南涧诗集序》中说，自己天性不喜作诗，尤其不喜给他人的诗作序，而南涧是个例外，因其诗“不徇乎流俗之嗜好”，是“真合乎古诗人之性情而必传之诗也”。钱大昕一直视李文藻为同气相求者，称二人“臭味相投”，“方其在京华，每一日不相见，辄慨然若失”，“其归也，每越月逾时，手书必至，得古书碑刻或访奇士，必以告”。后来文藻在岭南“瘴疠之区”为官，钱大昕内心总是惴惴。李文藻英年而歿，钱大昕饱含悲痛为其写下墓志铭，其中论述南涧人生之错位：“南涧有三反：长身多髯，赳赳如丈夫，而胸有万卷书，一也；生长于北海，官于南海，二也；湛思著书，欲以文学显，而世称其政事，三也。”概括得十分恰当。

# 范仲淹与《伯夷颂》

◎王华庆



青州范文正公祠內的范仲淹坐像 逄红军 攝

农历的十一月，在青州应该是最为寒冷的时节。经常是北风呼号，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到处都能感受到寒气凛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九百多年前，在青州的署衙内，一位疾病缠身、眼力昏花的老人在伏案认真地书写。他就是已经63岁、时任青州知州的范仲淹，正在书写《伯夷颂》。

《伯夷颂》是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一篇文言散文，其内容是说商末孤竹君的儿子伯夷，在父亲死后不愿意继承王位而逃到周国，周武王伐纣灭商，他又耻食周粟，匿迹于首阳山，死于病饿。

## 范公书《伯夷颂》原文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而不惑者，则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举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既死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于后世矣。

皇祐三年十一月戊申高平范仲淹书

## 范公书后小叙

示谕写黄素为《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且写伯夷颂上呈。此中寒甚，前面笔冻，欲重写，又恐因循。书札亦要切理，未是处，无惜见教。

范仲淹书写《伯夷颂》，缘起于同僚好友、时任京西转运使的苏舜

元。苏舜元深知范公不仅是国家栋梁之材，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书法家，尤其是他的楷书备受世人称道，便慕名向范公索字，请范公给他书写《易经·乾卦》，以欣赏收藏。范公欣然答应，但解释说《乾卦》字数太多，又“此中寒甚，前面笔冻”，且“眼力不逮”，难以完成，便于宋皇祐三年(1051年)十一月，在青州官署手书了这幅《伯夷颂》，并附书后小款。

范公为政清廉，署衙环境冷到竟然能使书写中的毛笔尖结冰。我们可以想象，在严冬之时，一位疾病缠身的老人，不顾寒冷，不停地朝着笔端呵气化冰，在案几上认真地书写，一笔不苟，笔意严谨，章法合度，循规循矩，绢面整洁如新，完成了这绝美的书法艺术作品。

此时的范公，仕途上几经辗转贬谪，颠沛流离，身体状况已是很差(半年之后，也就是第二年的五月，他就赴任颍州知州的路上病逝在徐州)。但范公犹一老骥，仍在砥砺前行。我们从他的作品中，能够看到一个资深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所特有的深邃睿智、刚毅坚韧；看到他立志为国，刻苦读书，终于金榜题名，走向仕途；看到他虽屡遭贬谪，但所任其职，精谋其政，惠政于民；看到他在朝堂上锐意改革，积极推动庆历新政；看到他威震西疆，御强敌于国门之外，让“西贼闻之惊破胆”，“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行，也怕那范小老子”。收笔之后，范公疲惫的身躯靠在座椅上，布满沧桑的脸上露出了些许欣慰的微笑。

范公为什么不写《乾卦》而书写《伯夷颂》？按说既然苏舜元索字的内容是《乾卦》，一般情况下范公应该满足其要求。但《乾卦》篇幅很长，此时的范公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又是如此恶劣的环境，确实难以完成。那么再选写什么呢，这就需要看范公所思了。范公当然要选自己推崇、字数又不是很长的文章。纵观范公一生所经所历，儒学修养、政治主张、为官之道，韩愈的《伯夷颂》就成了范公的最佳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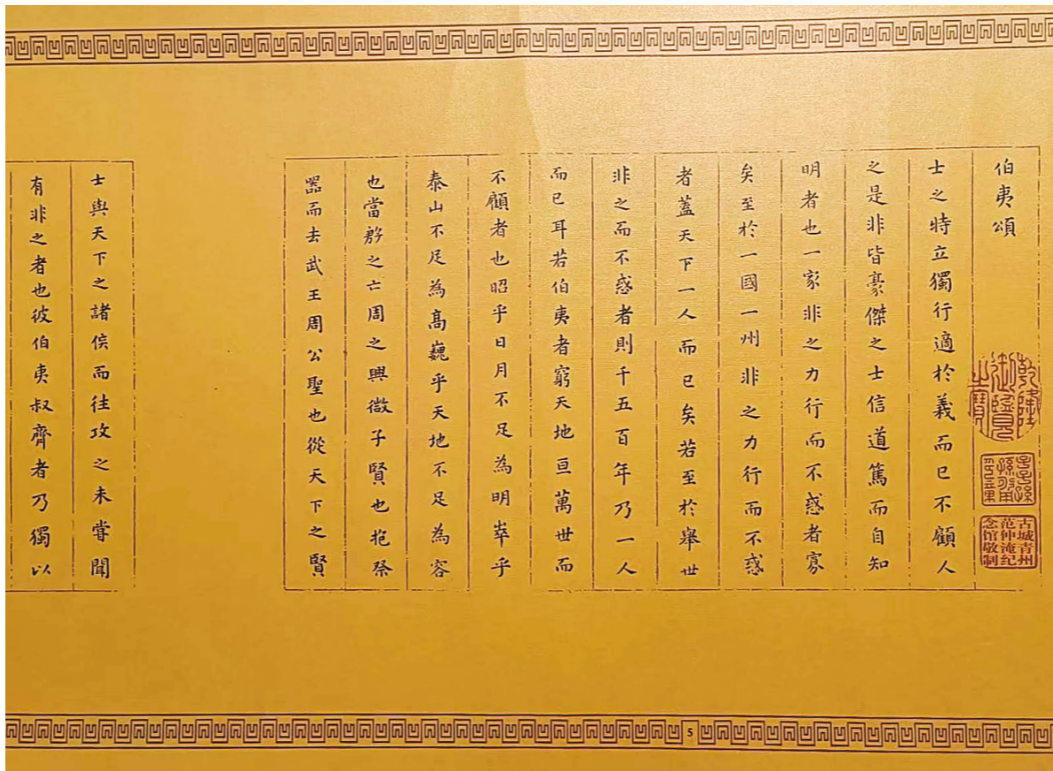
首先，范仲淹一直推崇伯夷，把伯夷当成特立独行、抱节守志的

典范。抱节守志是中国历代学者良才的修身信条，范公自己就把名节看得特别重要，遵循这个信念，而终其一生。范公的许多文章诗词都体现了这个信念。范仲淹去世后，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说：“由初迄终，名节无疵。”南宋理学家朱熹说：“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又说：“宋朝正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宋史·范仲淹传》写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其次，范公一直推崇韩愈。韩愈累官监察御史，后因论事被贬。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念，被后人推崇为写作散文的信条，范公更是悦其文笔，赏其文章，当作典范反复诵读，自己许多文章都有韩愈之风。范公也很敬佩韩愈为国为民，虽屡遭贬谪，仕途跌宕，但仍刚正不阿的为官之道。纵观范公的一生，他也是践行了这条为官之道。

再次是表明态度。范仲淹借书写《伯夷颂》，与同仁、同道共勉：为人、为官要始终怀着赤诚初心，矢志不渝，即使艰难困苦，也要砥砺前行。这样的宣示，无疑会让看到这篇书法的人感受到鞭策、提醒、希冀、教育和勉励。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苏舜元收到此佳作之后，视为至宝珍藏。他将这件书法精品寄给文彦博、晏殊、杜衍等，请他们题跋。近千年来，范仲淹此书法真迹，辗转于皇家、宦宦、名家之手，被世人推为至宝，成为珍贵史料和千古佳话。其间曾碑刻于石，波折跌宕，留存至今，实为奇罕之事，以致题跋者不胜感叹：“屡失屡得，信有神物呵护”。在其辗转过程中，每过一家之手，便留下了他们的题字或印章。九百多年间，题跋者竟有112人，题跋99篇，令人惊叹不已！题跋者中有文彦博、富弼等忠勇之臣，有秦桧、贾似道等无良奸佞，有宋代书法家蔡襄、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甚至还有乾隆皇帝的亲笔手书，可谓丰富多彩，世之罕有。



范仲淹书《伯夷颂》复制件局部 (资料图片)

# 4000年前的“高科技”

——龙山文化黑陶薄胎高柄杯

◎崔斌



△龙山文化黑陶薄胎高柄杯 (资料图片)

山东龙山文化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因这一类文化遗存首次发现于龙山镇(今属济南市章丘区)，故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据测算，其年代距今约4600至4000年。在龙山文化的陶器中，黑陶最具代表性。黑陶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种器表或胎体呈黑色的陶器，杯壁厚度均匀，薄如蛋壳的蛋壳陶以0.2毫米的极致工艺占据了黑陶“小队长”之位。

安丘人吴金鼎发现了龙山文化。他在章丘城子崖最早发现了蛋壳黑陶，遗憾的是没有一件完整的器物。此后，他在包括潍坊在内的山东多地发现了完整的蛋壳黑陶。吴金鼎发表了《龙山黑陶文化之今天的观察》文章，这是关于龙山文化最早的专业论述。2023年，龙山文化蛋壳黑陶高柄杯获评山东省文物标识实物原型，这可是从全省500多万件可移动文物中突出重围的。

由此可见，潍坊和龙山文化的渊源不可谓不深，也让人自然关注起潍坊市博物馆里的龙山文化黑陶薄胎高柄杯。

潍坊市博物馆的高柄杯由杯身和杯柄两部分套接而成。上半部为直壁凹底的筒状杯身，顶部有宽平的盘状杯口。下半部为粗短的杯柄，直径比杯身略粗，呈筒状，末端与喇叭状的圈足相接。杯柄表面饰镂孔与斜线纹等。

高柄杯，胎体有厚有薄。一般由盘口、杯部、器柄、底座四部分组成，高度15至20厘米，平均厚度0.3至0.5毫米，最薄处仅有0.2毫米。

极薄的黑陶高柄杯质地细密，造型规整，色泽漆黑光亮，有的高柄上有圆形、三角形、菱形等镂空装饰。因其胎薄如蛋壳，俗称“蛋壳陶高柄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已有发现，极盛于龙山文化时期，并成为典型器物之一。

“黑、亮、薄、轻、硬”，是蛋壳陶的特色。何以“黑”？

小小的黑陶，展现了高质量的生产力。在制作上，黑陶要用到“渗碳”。在窑内制造烟罩，封闭窑炉所有通气孔，使窑炉内缺氧，这样烟雾中的碳颗粒就会逐渐渗入陶胎中，形成黑陶。

何以“亮”？研究表明，制作薄胎高柄杯应用锋利的刮刀工具，边旋转边到修坯泥，当器壁达到极薄时，再进行磨光。薄胎陶经过磨光、抛光等工序，导致胎体的石英、云母、萤石等反光物质的颗粒顺着同一个方向排列，对光线由漫反射变为平行反射，使得器表熠熠发光。

何以“薄”？在许多蛋壳陶上，可以看见极其细密的同心圆拉坯痕迹，说明制作时使用了快轮拉坯技术。因此有专家认为，制作蛋壳陶的快轮工具是世界上最早、最精密的手工机械。如此薄壁的陶胎在快速旋转中非常容易破碎，小型器皿对快轮轮盘设备的精密性与旋转时的稳定性，要求是苛刻的。现代制陶技术显示，顺利拉出厚度0.2至0.5毫米的陶胎几乎不可能，但是4000多年前的人做到了。由于至今没有发现窑址，4000年前的动力设备究竟是怎样工作的，我们只能止步于想象。

何以“轻”？黑陶高柄杯重量只有数十克，与材料密不可分。蛋壳陶取材于河湖中沉积的细泥，经反复淘洗不含任何杂质，最质朴却精细的材质保障了器物的细密，虽经拉坯塑形与成形器身依然柔软纯粹，加上窑炉的温度与烧制时间的精确把握，塑造了陶器轻盈却完美的形体。

何以“硬”？成品陶杯虽然胎质极薄，但其质地却极为细腻坚硬。经检测，蛋壳陶中含有相当数量的碳颗粒，而且它的形成方式，与现代碳纤维有相似之处。碳纤维，也是以硬度著称的。薄胎黑陶高柄杯仅出土于少数大、中型墓葬之中，高贵不凡，显示身份，应是当时的重要礼器。蛋壳陶制作步骤多，技术精，周期长，需要耐心细致，稍有疏忽，将前功尽弃，可以想见，当时这种高端器物的生产分配或许被特定阶层垄断。

神秘的黑色带着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发敬畏。耗费人力物力去达到一种极致，究竟为了什么呢？作为礼器才能合理地解释蛋壳陶的存在。用规范化的系统与工艺极致的器物来表现祭祀中虚幻的“礼”，这是权力的诉求。

“黑如漆，亮如镜，薄如蛋壳，硬如瓷”是考古学家李济在《城子崖报告序》中对蛋壳黑陶的评价，蛋壳黑陶杯也被称作“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作”。